

華僑支持辛亥革命原因的多維透視

——紀念辛亥革命 100 週年

陳雲云*

“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中國人”，這句話形象地說明了僑居海外的炎黃子孫人數之多、分佈之廣。縱觀中國近現代革命史，華僑作為一支特殊的愛國力量，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海外僑胞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不可忽視的動力之一。由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上都佔有顯要地位。歷史表明，華僑是這場革命強有力的支持者和參與者，不管是建立革命組織、傳播革命思想、資助革命經費，還是直接回國參戰、鞏固新政權，他們都付出了巨大犧牲、作了卓越貢獻。孫中山曾多次讚揚說：“華僑有功於革命”、“華僑是革命之母”。近年來，華僑與辛亥革命關係一直是近現代史研究的熱點。2010年10月24日，據對中國知網(包含中國學術期刊總庫、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等)的檢索，題名為“華僑”+“辛亥革命”的記錄有69條；據對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檢索，題名為“華僑”+“辛亥革命”的專著則有6部。可見，學界對華僑與辛亥革命的相關問題，已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而關於華僑熱情投身辛亥革命原因的研究尚不多見，通過以上方法，未檢索到專文、專著研究該問題，只是零星涉及並散見已有成果之中。本文擬以近代華僑愛國主義為主線，從文化淵源、國情驟變、思想發展、主體覺醒等維度對這一問題展開論析，以期有所裨益。

一、文化視點：投身革命的思想文化淵源

歷經千百年積澱的中華民族精神是近代華僑心向祖國、支持辛亥革命的強大的精神動力。近代華僑有著強烈的反清意識，並且最早接觸、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他們雖身處異邦，卻蘊含着包含愛

國主義在內的中華民族一切精神特質。

(一) 華僑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內在要求

華僑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海外支脈，民族屬性為中華民族。《詩經》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千古垂訓化作海外炎黃子孫生生不息的愛國主義(簡稱“華僑愛國主義”)。列寧曾經說過：“愛國主義是由於千百年來各自的祖國彼此隔離而形成的一種極其深厚的感情。”¹ 這種對自己祖國的深厚感情，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植根於一個國家或民族自身發展的堅實的歷史基礎之中，有着深遠的歷史文化淵源。作為中華民族精神核心要素的愛國主義，既是充當聚攏中華兒女心靈的“黏合劑”，也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深深地紮根於海外炎黃子孫心中。“愛國主義是一面光輝旗幟”²，牽引着無數愛國志士不斷踐行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振興中華”的信念，鼓舞着包括海外華僑在內的世代炎黃子孫，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鬥爭。華僑不論何時出國，寄居何處，愛國之心，拳拳可見。特別是在近代中國，華僑愛國主義表現得尤為強烈，對於這一點，中外史書，眾口一致。

經過長期薰陶培養起來的愛國主義感情是真摯和雋永的。華僑愛國主義不僅根源於“生吾育吾”的故土鄉情，同時又是在漫長的蘸滿血淚的浪跡生涯中，以及長期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惡劣環境中變得更豐厚、堅實和持久。艱苦的歲月、坎坷的人生，既磨礪了華僑吃苦耐勞、忍辱負重和堅韌不拔的品格和意志，同時也逐漸鑄就了他們那顆眷戀故土、熱愛祖國的赤誠之心。華僑不僅身體力行地為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作積極貢獻，而且諄諄教誨子孫後代也要前仆後繼，使對祖國命運的關注成為薪火相傳的中華民族文化精髓。所以說，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能夠得到廣

* 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

大華僑的積極支持，與華僑愛國主義有着深刻的聯繫。

（二）華僑“反清復明”思想根深蒂固

辛亥革命前，海外洪門在華僑中擁有相當大的勢力。³ 海外洪門原是天地會的一個支派，是一個具有濃厚封建會黨色彩的反清組織。毫無疑問，加入洪門的廣大華僑會員具有反清意識。不少華僑是在國內無以為生才被迫出洋“淘金”，出洋後，早期的清政府拒絕予以保護，隨後國力孱弱，又有心無力。當識破滿清政府腐敗賣國的本質之後，他們的反清思想不斷滋長。因此，以“反清”為宗旨的海外洪門受到僑眾的認同，不斷發展壯大。據《東方雜誌》記載，辛亥革命時期世界各地約有 630 多萬華僑⁴，“華僑列籍堂（“致公堂”）內者，佔十分之八九”⁵，在東南亞華僑中，情況也大體相同。洪門所宣揚的“反清復明”等主張，客觀上啟發了華僑的革命意識，為後來他們走上革命之路、支持辛亥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

傑出僑領孫中山本人，長期僑居海外生活學習，系統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這種人生經歷使其更易接受並形成反封建的思想。一方面深受洪門反清思想的啟蒙與薰陶，他創立的興中會的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便帶有洪門“反清復明”思想的歷史烙印；另一方面孫中山曾加入洪門，並受封為“洪棍”（即元帥），致力於改造洪門。例如在舊金山與洪門致公堂大佬黃三德合作，全體美洲同盟會會員入堂，重新修訂致公堂章程，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黨的宗旨，因為致公堂會員在美洲華僑中佔大多數，他們的加入，給革命黨增添了不小的有生力量，此外，美洲致公堂屬下的華僑雖不明革命宗旨，但經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數年的宣傳、發動，紛紛轉向革命。孫中山通過洪門發動華僑會員支持革命，不但保護了革命黨人的海外組織及各種活動，而且還將僑眾樸素的反清意識引向關心熱愛祖國、支持祖國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

（三）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為華僑支持革命提供強大精神動力

“華僑熟悉西方事務”⁶，其中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理念和政治制度就是一個方面。近代華僑由於生活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或這些國家的殖民地，是中國人中，最早接觸、接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人，容易接受反封建主張。特別是華僑中的知識分子、領袖人物，更能把握時代的發展脈搏，洞察清王朝的弊端，參政意識、民主觀念、革命性更強烈。加上華

僑精英的引領，僑眾更容易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全力支持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胡漢民在南洋動員華僑捐助和參加革命時就感歎道：“華僑對於革命是很熱誠的。大概是受了外國人的壓迫，對於祖國的觀念比較深切一點。華僑中有頭腦的人總是想把中國造成一個體面的國家，那麼他們對外交際的時候也是光輝一點。”⁷ 因此，廣大愛國華僑在輿論及革命實踐中無條件地支持辛亥革命，並且對中國封建宗法倫理思想進行無情地批判，是與他們在國外受西方民主、革命等文化價值觀念的薰陶分不開的。率先覺醒的華僑成為革命的主要動力，他們“或輸財以充軍實，或奮袂而殺國賊，其對革命之奮鬥，歷十餘年如一日。”⁸ 廣大華僑對於西方文化思潮的接受與認同，使他們轉而支持並投身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

二、國情視角：民族危亡局勢的激發

江澤民曾經指出：“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範疇，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容。”⁹ 華僑愛國主義的內涵和外延隨着國情的發展不斷延展變化，並打上鮮明的時代印記。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救亡圖存是中國近代社會的主旋律，這對華僑有着直接的關聯和影響，它是華僑愛國主義的核心內容，具體則表現為致力於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務，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近代中國積貧積弱，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革命前夜，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社會危機和高漲的革命形勢為華僑愛國主義加入了新的“催化劑”，促使無數華僑追隨孫中山，走上了救亡建國之路。

（一）禦侮救亡成為喚起華僑愛國主義熱情的主要動力

最能激發華僑愛國主義的，還是祖國因遭到西方入侵而面臨的危厄形勢。華僑“無論貧富，都在中國發生對外戰爭時支持中國”。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憑藉船堅炮利，狼攫虎揉，對中國發動了數次侵略戰爭，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通過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逐漸控制了中國政治、經濟及其他方面，使中國墜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無數歷史事實證明，列強侵略是中華民族在近代歷史上蒙受一切屈辱、遭受一切災難的總根源，這決定着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革命首要解決的問題，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成為近代華僑愛國主義的

主要表現。事實上，華僑在中國近代史中煥發出的愛國主義精神，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廣大華僑面對中華民族慘遭蹂躪，眼看祖國河山遭到瓜分，“位卑未敢忘憂國”，毅然舉起愛國主義大旗，懷着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責任感，毫無畏懼地挺身而出，擔負起抗擊外國侵略者的歷史重任，融入辛亥革命的滾滾洪流。有學者認為，近代海外華僑社會的民族覺醒並大規模參加祖國反帝反封建的救國運動，是在 19 世紀末民族危機加深前提下開始的。¹⁰ 為挽救瀕臨危亡的中華民族，華僑愛國主義精神在近代得到空前光大。

（二）推翻腐朽的晚清政權成爲華僑支持革命的又一現實要求

鴉片戰爭開始，晚清王朝“體制內”的部分人，在西方列強的淫威面前，惶然無措。爲求苟安，惟有委曲求全。雖然包括華僑在內的中國人民曾以各種形式對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了激烈的反抗，並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囂張氣焰，但遺憾的是這些反抗並沒有真正改變中國不斷遭受侵略和蒙羞的現狀，相反，中國更加深陷外國的干涉和控制之下。同時，封建統治者同華僑之間存有尖銳的階級矛盾，正如一些華僑埋怨道：“我們害怕中國官吏的檢查，他們手下員司的壓迫和自家人和鄰居的虐待。在我們回國時，我們會被誣控爲夷人的暗探，爲奴隸的購買者和拐騙者。很多長年的積蓄被盜竊了。另一些人，家裏房屋被拆毀，而且禁止他們重新建房；更有些人被迫要償還僞造的借據，我們孤立無援……，四面八方被賊人所包圍。”¹¹ 有親屬在國內的華僑，更是受到晚清腐敗政府的敲詐和勒索，就像一位華僑史專家所說的，“華僑的民族覺醒與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主旋律完全吻合，是合乎時代潮流的覺悟。因此說，這是偉大的民族覺醒。華僑之所以有這種覺醒，是因爲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他們關心祖國的命運，並將祖國的命運與自己的命運聯繫在一起。而這種覺醒只有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才能出現，沒有辛亥革命的蕩滌洗禮，華僑思想深處的這種覺醒也就無從談起，也就成爲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兩者是互爲因果的關係。”¹² 因此，包括華僑在內的中國人民逐漸認識到近代中國之所以貧窮落後、屢遭列強侵凌，完全是由中國封建制度及其腐朽統治造成的，要徹底改變祖國貧困落後的現狀，尋求救國救民之路，必須推翻封建專制，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三、思想視野：革命黨人的思想啓蒙

華僑雖爲“革命之母”，但並不是天然的革命者。當時華僑社會普遍是“風氣未開，進行遲滯”。華僑革命態度的轉變和對辛亥革命的支持，與孫中山等人對改良思潮的批判是分不開的。此外，海外革命媒體對廣大華僑進行深入細緻的宣傳、動員和革命理論的啓迪，使其明白革命的宗旨和意義，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思想啓蒙作用。

（一）華僑中康梁改良思潮的肅清

華僑向來是愛國的，但因受到以康梁爲首的保皇黨改良思潮影響，起初對革命存有戒心，認爲革命是大逆不道的，因爲“保皇會此後在流亡狀態下繼續它的工作，大大地侵害了孫中山在海外華僑中所得到的支持”¹³，造成“大多數華僑傾向康梁的保皇會，不那麼贊助孫中山和其他革命者。”¹⁴ 客觀地講，保皇派所宣傳的一系列關於“救國”、“保種”等主張，在激活、催化華僑愛國主義方面，曾經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隨着革命形勢的不斷高漲，改良主義的救國方式必將退出歷史舞台，要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必須採取暴力手段把“皇帝拉下馬來”。此外，保皇派還極力反對革命，不可能主動放棄改良主張。因而，要燃起華僑“革命的心”成爲革命黨人的重要任務。

將華僑視爲基本革命力量的革命黨人，爲使華僑轉變政治立場，必須與保皇派進行論戰，揭露其真面目，使華僑懂得“愛國就要救亡，救亡就得革命”的道理。爲此，革命黨人與保皇派進行了一場曠日持的、氣勢磅礴的論戰，孫中山親自撰寫《敬告同鄉書》和《駁保皇報書》兩篇文章，深刻揭露清政府和保皇派的醜惡嘴臉，闡明中國非革命不可的道理，有力批駁了保皇黨的荒謬言論，傳播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從而使華僑“耳目爲之一新”，認清改良主義已不符合社會發展的潮流，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行不通的，這對華僑思想轉變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爲華僑參加革命掃清了障礙。透過史料，不難發現華僑由改良轉向革命的事例不勝枚舉，華僑革命風氣漸開，“在革命前夕……移居海外的華僑則表現得更激進。”¹⁵ 可以說，原來支持保皇派的大多數華僑紛紛倒向革命，並非少數個人的轉變，華僑由原來的“忠君”、“保皇”，到推翻封建皇帝的專制統治，這無疑是思想上的一個質的飛躍，這種可貴轉變，爲華僑轟轟烈烈地支持和參加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礎。

(二) 革命媒體是華僑接受革命思想的主渠道

思想往往是行動的先導。為開啓民智，引導華僑贊助革命、參加革命，充分發揚華僑愛國主義精神，革命黨人在海外廣建革命組織的同時，還積極籌辦各類媒體，鼓動華僑革命。“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建國主張最終能得到多數華僑的認同和支持，不僅是因為他具有若干天然的優勢，更重要的是他作出了巨大努力，採用了富於現代性且適合華僑的動員和組織方法。”¹⁶

革命宣傳的首要任務和基本方法就是積極著書、創辦僑報。孫中山指出：“欲喚起國民及不為康梁所惑，首須創立宣傳機關”¹⁷，他在《民報》的發刊詞等文章中系統地闡述的三民主義和五權分立思想，尤其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為多數華僑所接受，喚醒了廣大華僑民主和革命意識。同時，革命報刊是革命派批判改良派的重要平台，據初步統計，當時亞、美、歐、澳等幾大洲約有 80 多家華僑報刊先後捲入這場論戰，真可謂唇槍舌劍，筆槍墨炮，硝煙瀰漫。其次，革命黨人在美洲和南洋各地建立書報社，宣傳革命，特別是爭取華僑中下層對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如舊金山的“金門少年學社”、古巴的“三民閱書報社”等；南洋各地設立的書報社更多，如新加坡“公益書報社”，馬來西亞“益智書報社”，緬甸“覺民書報社”等。此外，除了革命黨人的宣傳之外，廣大愛國僑領也認為“提倡革命，非借報館為喉舌不可”¹⁸，並且加入革命宣傳隊伍，對僑眾進行思想啓蒙，從而擴大了革命派在海外華僑中的影響。比如華僑出資創辦的《圖南日報》(新加坡)、《中興日報》(新加坡)、《民生日報》(檀香山)、《覺民報》(曼谷)、《光華日報》(檳榔嶼)、《泗濱日報》(爪哇)等，其作用不可小覷。華僑在接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學說的基礎上，廣泛接觸進步媒體，加強自身的革命性。這不僅促進了海外僑胞的覺醒，還將樸素、朦朧的愛國主義逐步引向革命愛國主義的軌道，使華僑愛國主義得到進一步昇華，有力地配合國內的革命活動。正如有些華僑所說：“沒有孫中山先生到南洋宣傳革命，則數十萬華工，無從認清祖國的危機，更無從參加革命。”¹⁹

四、主體維度：華僑自身利益和心理訴求

中華民族受幾千年來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影響，形成獨特的民族優越感，也孕育了鮮明的民族個性和民族尊嚴。但鴉片戰爭後，中華民族被西方列強

視為“劣等民族”、“東亞病夫”，這種從未有過的民族屈辱感強烈刺痛了包括海外僑胞在內的每個炎黃子孫的心。近代華僑作為中華民族的海外成員，對祖國的民族認同感尤為強烈，這是由於近代中國的命運與海外華僑的命運有密不可分聯繫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一種割不斷的情緣。國務院僑辦主任李海峰指出：“歷史證明，華僑華人的命運永遠與中國盛衰榮辱緊緊聯繫在一起”²⁰，祖國作為華僑的靠山和後盾，其強弱興衰直接關係着僑胞在海外的利益和處境。

(一) 近代華僑內心的屈辱

鄧小平曾說：“凡是中華兒女，不管穿甚麼服裝，不管是甚麼立場，起碼都有中華民族的自豪感。”²¹而近代華僑在海外從事各種體力勞動或經商、開發種植園和礦區，為僑居國的開發和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因身處異域，孤立無援，備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奴役與歧視，甚至連做人的尊嚴也遭到踐踏，承受着寄人籬下的屈辱。如在古巴，華工一上岸，便被剝光衣服，拉到奴隸市場上出售，任由買主們檢查、挑選。進入種植園後被帶上腳鐐，每天勞動 16 個小時以上，晚上睡覺還得把手腳網上，以防逃跑。由於外國資本家的殘酷剝削，華工的死亡率非常高，即使逃脫了死亡，積累了一點財產，乃至成為資產者，但在許多國家也避免不了受歧視的厄運。²²由此可見，因為國家、民族的不幸遭遇，不論是被當作“豬仔”的契約華工，還是漂泊海外的華僑資本家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都受到嚴重挫傷。為了修復受損的民族情感，無數華僑毅然擔負起維護祖國尊嚴和自身人格的責任。

華僑在國外屢遭不平等不公正待遇乃至殘害，得不到應有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必然將自身地位的謀求、權益的維護與中國的強大聯繫在一起，強烈渴望有一個強大國家保護他們，因為血淚斑斑的海外僑居史使華僑深刻體會到“外人之所以欺我侮我者，皆我國之不振有以致之”，“深知國家不強之可恥可痛”。²³而腐敗無能的清王朝認為華僑在海外的種種遭遇和屈辱只是咎由自取，甚至將華僑看作是背棄祖宗的“天朝秀民”，僑胞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許多華僑客死他鄉，遺恨九泉。雖然晚清出現過像薛福成、黃遵憲這樣開明的外交官，曾因華僑的悲慘遭遇奔走呼號，但因晚清政府自身難保，根本沒有能力維護僑益。就像費正清在《劍橋晚清史》中所說的：“華僑對西方帝國主義有所認識，但同樣至少也

感到滿人無能，不能保護他們免受香港、新加坡、河內和舊金山的歧視政策之害”。²⁴ 近代華僑屈辱的遭遇使其深感自身命運與祖國是否強盛息息相關。

(二) 華僑內心呼喚革命

中華的崛起是華僑永恆的期待。從心理角度分析，一方面華僑資本家和華工普遍對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懷有極大的憤懣；另一方面心靈深處企盼祖國早日擺脫貧窮落後，作為海外赤子的堅強後盾，保護其正當的、合法的權益。這種殷切期望，便是積蘊在華僑心中的火種。正是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華僑對革命抱以極大的熱忱，或慷慨解囊，或親赴疆場，支持和參加辛亥革命，“海外華僑夢寐以求的是用建立最現代化的政治與經濟組織的方法，恢復祖國的國際威望。”²⁵ 此外，強大的祖國如果也得力於華僑的貢獻的話，那無疑也有助於華僑他日“落葉歸根”及其在國內親屬的地位的提高。而華僑的中國人意識也是重要的一點。

廣大華僑在僑居地仍是懷着“過客”的心理，華僑與祖國在血緣和文化上的聯繫，使他們在政治上認同於中國，這種中國歸屬感又由於在海外的挫折而加強。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正反映了華僑的願望，滿足了他們的對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心理訴求，因此得到廣大華僑的熱烈擁護。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在談到華僑對辛亥革命巨大貢獻時曾指出：“海外華僑是辛亥革命的強有力的支持者。這些革命的華僑，有工商資本家，也有更多的工人和小工商業者。他們在海外受盡了帝國主義反動派的骯髒

氣，迫切希望有一個繁榮富強的祖國。”²⁶

同時，革命黨人在海外媒體上宣傳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也是與廣大華僑期望祖國強大的願望與要求是相契合的，這對僑居海外、寄人籬下的廣大僑胞來說，具有特殊的感染力和感召力，因而贏得了“僑心”。而且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艱苦奮鬥、一心為革命的高風亮節在華僑中樹立了崇高的威信，與當時一些假借革命之名以營私、揮霍浪費華僑血汗錢的偽革命相比，更容易打動華僑的心。所以當聽聞武昌起義勝利的喜訊後，海外僑胞為之振奮，以各種方式表達內心欣喜之情；當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成立的消息傳到海外時，更是歡喜若狂，其中華僑的賀電“為日盈尺”。

國強則民富，一個獨立、強大的國家才能最大限度地代表海外僑胞最根本、最廣泛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海外華僑雖然與祖國相距遙遠，但他們的利益與祖國的興衰榮辱息息相關。華僑之所以積極支持革命，自身利益考量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尤其是其中的華僑資本家。此外，辛亥革命之前華僑社會已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為他們支持祖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經濟基礎。

從國際視野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場新的革命風暴正席捲亞洲。在資產階級領導下，朝鮮、菲律賓、伊朗、土耳其等諸多亞洲國家爆發了有各階層人民參加的群眾性民族民主革命。散居在亞洲各國的華僑，必然受到僑居國革命風暴的影響，走上本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而華僑支持辛亥革命也成為亞洲覺醒的重要組成部分。

註釋：

- ¹ 列寧：《列寧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9-580頁。
- ² 江澤民：《論科學技術》，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60頁。
- ³ 白壽彝：《中國通史》（第十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8頁。
- ⁴ 任貴祥：《華僑與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36頁。
- ⁵ 政協陝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8-278頁。
- ⁶ [美]費正清等：《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460頁。
- ⁷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12頁。
- ⁸ 見《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3頁。
- ⁹ 江澤民：《愛國主義和我國知識分子的使命》，載於《人民日報》，1990年5月4日。
- ¹⁰ 任貴祥：《華僑與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34頁。
- ¹¹ 《華工出國史生平滙編》（第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1頁。

- ¹² 任貴祥：《辛亥革命與海外華僑的民族覺醒》，載於《八桂僑刊》，第4期，2001年，第19頁。
- ¹³ 同註6，第375頁。
- ¹⁴ 同上註，第386頁。
- ¹⁵ [美]費正清·劉：《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480頁。
- ¹⁶ 羅福惠：《孫中山時代華僑的祖國認同》，載於《近代史研究》，第6期，1996年，第132頁。
- ¹⁷ 胡去非：《國父事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45年，第37頁。
- ¹⁸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二冊)，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1944年，第172頁。
- ¹⁹ 同註4。
- ²⁰ 李海峰：《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拓展和深化僑務工作》，載於《求是》，第16期，2007年，第20頁。
- ²¹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頁。
- ²² 劉波等：《愛國主義是民族之魂》，青島：青島出版社，1990年，第150頁。
- ²³ 廣東華僑歷史學會：《華僑論文集》(第三輯)，廣州：廣東華僑歷史學會，1986年，第31頁。
- ²⁴ 同註6，第383頁。
- ²⁵ 同註15。
- ²⁶ 《董必武在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載於《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6534/6561/20010927/571477.html>，2001年9月27日。